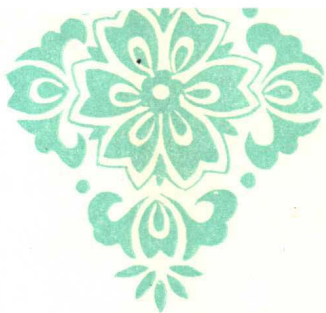


民族团结征文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龙凤呈祥

民族团结征文选

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龙 凤 呈 祥

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曾果伟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

*

198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39,000 印张：6.5 印数：1—4,800

统一书号：10109·1754 定价：0.52元

目 录

苗寨的客人	宋梧刚 (1)
吉祥的青鸟	林 河 (6)
稻乡情	胡应南 (10)
土家蛇村	华 山 (21)
珍珠花	周石山 (26)
追求者的足迹	王友生 (32)
她心中有个灿灿的金杯	马治平 郭垂辉 (40)
闪光的足印	易国华 谢端定 符兴元 (47)
“金达莱”赞歌	袁章铁 赵铭乾 (51)
一朵盛开的雪莲花	杨顺初 (55)
回族女经理	张晓立 贾若华 (59)
尺短情长	向天桂 (65)
在湘西,我遇见一位高山族姑娘	国 政 (70)
西渡镇的“美容师”	颜昌健 蒋春达 (76)
马路上认下的亲戚	谭利姪 (78)
古榕书屋访画家	彭庆元 (82)

他在春天的田野上歌唱	彭庆元 (86)
清泉	陈耀平 (91)
金色的音符	韩定昌 (97)
还是侗乡那座风雨桥	易允武 (102)
在求索的山径上	周全胜 (107)
山路, 通向远方	林彰善 (113)
金凤恋瑶	唐曾孝 (119)
拉萨姑娘央金在长沙	贺冬林 (123)
深山苗医	彭官智 (128)
果雄毕兹卡的好大夫	全华山 (133)
志在苗乡灭虫害	文庭芝 (138)

龙凤呈祥	龙保生 黄溪云 (144)
千里一家亲	敬庄 雄飞 友谦 欧黄 (149)
青翠的核桃林	郑 春 (153)
天寒心头暖	唐宽如 杨吉才 李克明 (157)
芙蓉国里的维吾尔族人	王先春 余铭衷 (162)
峻岭“轻骑”	彭德荣 石少成 (165)
春暖侗乡	秋 鸿 (170)
窗口	周江南 (177)
凭窗一席话莽山	李湘俊 (184)
家乡的小桥	黄忠汉 (190)
铜铃叮咛	易启茂 (193)
壮家“龙累”山歌多	黄世光 (196)
西兰卡普	覃仁安 (200)
永顺铜柱	华 山 (203)

苗寨的客人

宋梧刚

今年正月，在湘西苗寨，这个历史上被称为“中国盲肠”的地方，出现了罕见的热闹。载歌载舞的苗家，此刻更是欣喜欲狂了。北部的龙山，寨上恢复了摆手舞，歌声响亮，银镯叮当；南部的吉首，这个过去人口不到几千的千户所，近年来生产发展，人口增多，使它成为初具规模的城市了。建市后第一个春节，热闹非凡。按此间古朴的乡俗，“初一崽，初二郎”，这两天是走亲戚；到了初三山鸡初唱，各族人民便按捺不住，一个个身着节日盛装，涌向吉首……

阳光掠过头顶。距吉首十余里的苗寨寨阳的一栋木屋的门口，忽然开来四辆汽车，停在门前。从上面下来十来个人。走在最前面的叫张太顺，是副市长。副市长笑咪咪地对两位主人说：“杨昌南、石绍玉同志，上面来了同志，要给你们苗胞拜年，还想乘便开个会，谈谈心。”

“天哪！”石绍玉叫了：“要开会得早点通知呀！如今，当家的男人们多数上吉首了，家里尽些些老婆子。客话（汉语）也说不来。”可张太顺却说：“不要紧的，你去喊喊看。”

等她匆匆喊来了几个妇女时，“上面来的”同志已经走上台阶了。“你们家门口这副对联：‘春回大地风光好，幸

福人家喜事多’，倒是很好。只是要看看你家里如何……”
有个干部说。

“这火塘上吊的腊肉，该有一百六七十斤吧？”那干部进屋，刚刚到火塘边，便问。

“嘻嘻，你同志眼力不弱，有一百七十来斤。”

“是买的么？”

“不，是自家宰的年猪。”

“呵，”接着，人们一个个坐定了。石绍玉发现，还是那个红光满面、额头很宽、样子看来比自家那个五十来岁老信子还显得年轻的干部喜欢问话。他又问起昌南来了：

“你家多少人？分了多少责任田？收入多少？”

“七口人，六亩八分田，山土四分，收了六千八百来斤，产值一千八百来元。”

杨昌南刚刚答完，那干部又问他弟嫂石新妹：“你呢？”

“五亩，三千来斤。”苗族同胞在生人面前，常常讷于言辞，一句是一句，硬梆梆的。

“够吃么？”

“原先学大寨时，才人平三百一十斤呀，如今有五百三十斤了。节约点，可以了！”

“嗯！”那干部若有所思地：“倒也是实在话！”他又问昌南：“有存款么？”

“有。存了二千四百元，五年。活期存款没有。”

“你会做生意么？”另一位干部似乎有些疑惑——怪不得呵，湘西素来穷得出名呢。

“我不会。”

“这是政策允许的。可以搞搞长途贩运。活跃经济么！”

原先问话的干部以为他可能有顾虑，解释说，随后又问：“八三年，你打算……”

“产值翻一番。由一千八百元到三千六。”杨昌南劲鼓鼓地回答。

“根据呢？”那干部这时显得特别过细，象是有些信不过，杨昌南扳起了指头，开始一桩桩说了……

这时，一个年轻人闯了进来，这人就是杨家二十七岁的儿子杨春生，吉首中学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这年轻人见过些世面，一进来就说：“首长们来我家拜年啦！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他抱起儿子，想挨个给干部们拜年。那干部站起来招呼了：“小孙孙串眼皮（困觉）了，莫吵醒了，莫让他着了凉，抱他去睡吧！”

杨春生仔细地瞧了瞧那人：“咦，您好象是胡耀邦总书记吧？”

“你怎么认得我？”那干部一经点破，更坦荡了。

“我是在电视里认识您的！”

“好！你既然认得我，我也要认识认识你了！”总书记微笑着：“我问你，党对农村是什么政策？”

杨春生很快回答了，结尾，重重地补了一句：“希望这个政策稳定下来。”

总书记没有直接回答，却问：“你家收入呢？”他显然是要核实一下数字。

父子所述相符。总书记笑了。这时，杨昌南看了看表，总书记转问他：“你还有表？”“嗯，春生也有！”“这么说，有两块！”总书记笑了：“还买了别的么？”“自行车

两部，缝纫机两部。”“嗯！电视机咧，有么？”“我家如今还没有，但今年肯定会有！”总书记大声笑了，笑声盈屋，主客都显得更自由舒畅了。

总书记问道：“你家男的都有表，女的呢？”“没有。”“你们轻视女的！”总书记的神情严正。“冤枉！”儿子笑嚷了：“女的戴银项圈嘛！”他把姊妹的雪亮的斤两颇重的银项圈拿了出来，给总书记看。“我来试试看！”总书记一边说，一边戴。杨昌南便叫儿子将银项圈给他解开，才算如愿以偿。

好客的苗家，把他们的春节礼品摆了出来。一盘糖撒，一盘柚子，一盘葵花籽，一盘糍粑。杨昌南取了个糖撒放进水杯里搅拌后，端给了总书记。总书记感动地说：“我们共吃这碗糖撒吧！”他先尝了两调羹，然后双手捧给了主人。杨昌南呢，简直不知如何办了！他也照吃了两调羹，又捧给了总书记，怎么也不肯再吃。于是，这个任务只好由总书记最后完成了。

共饮糖撒后，总书记对杨春生说：“我们这么多人到你家吃一顿，不会吃穷你们么？”“越吃越有吃。”杨春生简直象在喊，连说了两句。总书记陷入了沉思。这似乎矛盾，但是，他的故乡浏阳也有这样的俗谚啊：“夜夜做贼不富，餐餐添客不穷！”

喇叭响了，总书记依依地走向汽车。马达鸣动，总书记从车中伸出手来，频频相招。

第二天，一个市委干部来到杨家：“来，请你签个字，领笔招待费。”这下杨昌南可生气了：“你讲什么？我不要！我不要！不是搭帮共产党，我这穷山里的苗家会有这样

的日子过？我会有几千元存款？会有手表，单车，缝纫机？会有满仓谷，满炕肉？……总书记会到我们这样的人家拜年？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有过？……我不要！我不要！”……那个干部无法，只好走了。

这话，似乎是这故事的一个注脚。愿它象许多有意义的民间传说一样，流传下去吧！

吉祥的青鸟

林 河

一场绿色革命的风暴正席卷全球。

粮食危机已成为人类未来最大的威胁。解决的办法之一，便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粮食产量，也就是进行被人们称之为“绿色革命”的粮食革命。

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一次伟大的绿色革命，那就是变野生植物为栽培作物。我国浙江河姆渡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籼型栽培稻堆积层。它雄辩地证明：我国古代的越族人民，就曾经进行过这样的“绿色革命”。

而今天，当全世界都在为又一次绿色革命艰苦奋战时，被誉为对绿色革命有伟大贡献的“籼型杂交水稻”在我国培育成功了。它再次向全世界宣布：伟大的中华民族又一次走在绿色革命的前列。

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努力、团结奋战的凯歌。袁隆平是这支凯歌的创作者之一。

五十年代初期，二十三岁的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湘西沅水之畔的小镇安江，担任了安江农校的教师。

湘西这个地名，对袁隆平并不陌生。他童年时，日本侵华，国土失守，曾随父母逃难到过湘西的门户——桃源。但是，当他父亲了解到湘西就是古代有名的“五谿蛮地”，听

到人们谈论湘西的“苗蛮”、匪患、穷山、恶水……不由得毛骨悚然，再也不敢前进，又转帆洞庭，投奔四川去了。

谁知十年之后，袁隆平又与这“穷山恶水”的“蛮夷”之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解放以后的湘西，很快消除了旧社会那种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惨象，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但是五十年代末，曾经一度“苦日子”降临，袁隆平的汉、侗、苗、瑶、土家等民族的学生，从不同的家乡带来了一个相同的消息：饥饿、浮肿。袁隆平所到之处，见到的是一双双饥饿的期待的眼睛。

袁隆平常爱引用著名科学家巴斯德的一句名言：“机遇只对有心人才有恩惠。”被人视为“走白专道路典型”的他，自然不会明白酿成这场饥饿背后的政治原因，但湘西各族同胞过去和眼前的灾难，他们那一双双饥饿和期望的眼睛，却触发了他做为一个农业科学家的责任感。怎样才能为湘西各族人民乃至全人类彻底摆脱饥饿而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呢？他开始思索、探求了。

啊！就是这一偶然的机遇，加上做人的责任感，于是，为了人类免于饥饿而去开拓美好前景的“籼型杂交水稻”的试验研究开始了。而且，很快就成为中华各民族为之共同奋斗的事业。

科学史上，一项新的发明，几乎都要伴随着艰难曲折的经历。袁隆平的探索也不例外。有幸的是，每当他面临困难时，各民族兄弟总是从四面八方向他伸来了热情的手，帮助他一次又一次地渡过了险滩和暗礁。

“文化大革命”开始，正当他准备去戴上高帽接受批斗的时候，国家科委九局的一位当代“伯乐”，来了一纸公

函，责成湖南省有关部门支持他的科研，使他幸免于难。

事隔不到两个月，那些以摧残科学文化为己任的勇士们，又指使“红卫兵”把他的试验秧苗“横扫”得一根不剩。在他的事业面临这绝望深渊的时候，两个有心人——他的学生李必湖和尹华奇，冒着危险把四钵秧苗藏到臭水沟里，拯救了这未来的伟大发明。

当他的试验初具规模的时候，有人却散布：水稻这种自花授粉植物搞杂交试验是不会成功的，袁隆平是在重复外国人的失败。有人辱骂他是“科学骗子”，勒令他停止试验，叫他到工作队去搞宣传。在这时候，又是省里科研单位的一些“伯乐”们，出面支持他把试验坚持进行下去。

当需要缩短育种周期，加快试验速度的时候，云南傣族地区的各族人民为他的试验提供了四季如春的土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各族人民，为他的试验热情地提供了种种服务。

要使杂交稻具有显著的遗传优势，关键在于找到水稻的远缘亲属——野生稻雄性不育株，又是海南黎族苗族地区的热心人指点他们找到了它。

由于经验不足，杂交稻开始阶段只出现了“营养优势”，有些人讥讽说：“杂交稻，好是好，不长谷，光长草，只可惜人类不吃草！”这时候，袁隆平受到了沉重的压力。他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合作者帮助他育种，育出的种也无人敢要。在这艰难的时刻，广西壮族地区的热心人，大胆向袁隆平要去了杂交稻种，创造了晚稻大面积种植平均亩产一千二百斤的优异成绩，打破了广西种植晚稻从未上千斤的历史纪录。在壮族地区的土地上，奏出了凯歌！

现在，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已扩大到四亿多亩，在全国各族农民中出现了“杂交稻热”。

籼型杂交水稻到了美国，在美国的一次对比试验中，我国的杂交水稻比美国的良种增产了30—50%。

籼型杂交水稻也到达了以种水稻为主的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同样发挥了良好效益。

在杂交稻的摇篮——湘西怀化地区，杂交稻的推广使农业空前丰收，连高寒山区的侗族农民，也破天荒地结束了“糠菜半年粮”的贫困历史，能常年吃上香喷喷的白米饭了。

经过了百劫千难，杂交稻啊，就象一只吉祥的青鸟，它在湘西的土地上诞生，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爱护哺育下，终于羽翼丰满，冲天而起，翱翔太空，在美洲大地播下了丰收的种子，向亚非大陆送去了东方的祥瑞。这只东方的青鸟啊，现在已不只是中华各民族的祥鸟，它已成为全世界各民族共同的祥瑞了。

在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中心的会议上，幻灯不寻常地映出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字幕和他的头像，全场顿时欢声雷动。来自全世界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学者、专家，都起立向袁隆平鼓掌致敬。

为了表彰袁隆平在科学技术现代化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委把全国第一个科技特等奖的荣誉，授予了他和他的战友。

啊，吉祥的青鸟，东方的祥瑞，更高地飞翔吧！把这造福于人类的绿色风暴带向全世界，刮走饥饿、贫穷与死亡，把和平的福音传遍全球吧！

稻 乡 情

胡应南

一九七一年六月的一个清晨，东方还未透出鱼肚白，出工的钟声就在凉伞山寨低沉而悲咽地回荡。这钟声招引的不是一片劳动的欢声笑语，而是侗族乡亲们聚集一起的啼哭抽泣。他们身上背的喷雾器已失去了工作的意义，一场暴雨过后，几千亩稻田终于被稻瘟病全部吞噬。点头的稻穗倒伏了，橙绿舒展的稻叶枯黄卷缩了，社员们连续半个月的拼命防治都付诸东流。这意味着已连续两年遭受稻瘟病危害的凉伞人民还得在更长的时间里，吃着红薯、玉米、洋芋来度过艰难的日月。

淳朴刚强的侗族人民素来以刻苦耐劳而著称，但此刻也经受不起这个毁灭性的打击。

此刻，一位身材高大的妇女却从人群中悄悄退出来。她斑白的头发，黝黑的脸庞，两只浮肿的眼睛充满着无限负疚和伤悲的神情，步履沉重地朝凉伞河走去。

在流水潺潺的凉伞河边，她拧干裤脚重染的露水，洗去了脸上沾着细泥的汗水，但泪水却无法止住地从她的眼角溢了出来。

这位妇女名叫罗玉娥，她并不是侗族的农家妇女，而是壮族出身的凉伞中心农技站的农技员，六〇年于湖南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侗乡山寨，已有十一个春秋。

二

已是正午时分了，古铜色的侗乡木楼在太阳的灼照下，屋顶上冒出一丝丝热气。知了在树梢起劲地鸣叫，给一片耀眼的山寨增添着极度寂静的气氛。罗玉娥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炎热，还呆呆坐在凉伞河边。水稻被侵害的惨状，刚才侗族乡亲揪心痛哭的情景，象一幅有声的画面嵌刻在她的脑海里，搅得她的心都碎了。整整一上午，她坐在河畔的柳荫下，还没挪动一步，但她的内心却从未象现在这样震撼激动过，一种职业的责任感和她对理想、对事业的追求，驱使着她思想的良骥仍在与稻瘟病搏斗的战场上驰骋着。

在古代，防治稻瘟病采取的是烧毁以及让其自生自灭的方法。到了近代，人们普遍采用的是药剂防治。自从二十世纪初美国遗传学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创立了基因学说以来，人们用遗传理论作指导，以筛选优良品种的方法，来战胜稻瘟病。五十年代，我国的农业科技人员也开始这样做了。可惜没过多久，一场政治风暴卷起，托马斯·亨特·摩尔根的基因学说被扣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肆意批判，打入冷宫。基因学说无人问津了。在防治稻瘟病上，以前取得的一些成绩，也无人再发展下去。

稻瘟病仍然在猖獗危害！

凉伞地处湘黔边界，海拔五百至九百米。这里山高谷深气温低，雾多湿重日照短，更是稻瘟病生长的“窝窝”，罗

玉娥务农十年，就和稻瘟病打了十年交道。

起先，用药剂防治还是有效的。头几年，稻瘟病都被克瘟散、稻瘟净所制服了。但渐渐地，任何一种农药对稻瘟病都失去了有效的抑制能力，年复一年，喷洒的农药似乎给稻瘟病一次又一次地增强了抗药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稻瘟病就象逆境中站起来的巨魔，越来越顽强地显示在人们面前。在凉伞，一个新品种至多生长二三年，就得淘汰了。

在巨魔面前，罗玉娥的头脑里萌出了新芽，既然药物不能战胜稻瘟病，那么就根据基因学原理，筛选出抗稻瘟病的优良品种吧。她又犹豫起来：上大学时的一位老师，就因为坚持托马斯·亨特·摩尔根基因学的观点，被打成右派；

“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批判下放。自己出身不好，在一切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自己坚持和实践基因学观点，要是有人给你戴上一顶什么帽子，担当得起吗？

罗玉娥并没有畏葸不前。她想起了侗乡人们含辛茹苦，所换取的仍是以菜当粮的半饱生活；想起自己报考农学院时的金色理想；想起来凉伞山寨时，决心改变凉伞地区面貌的雄心壮志；只觉得有一股力量在鞭策她，有一股热血在她全身沸腾，有一座金色的山巅在召引着她，她正式向领导提出水稻瘟病抗源筛选的研究课题。

三

罗玉娥向领导和同行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同的品种，在同样的栽培条件下，发病程度不同。同一品种，在不同的栽培条件下，发病程度不同。这说明稻瘟病菌（寄生物）与水稻（寄主）之间，即致病与感病之